

《历史与思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与思想》

13位ISBN编号：SH13051-1002

10位ISBN编号：SH13051-1002

出版时间：1976-09-01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作者：余英时

页数：4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历史与思想》

内容概要

这部《历史与思想》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写的单篇论文的一个选集，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56年，最迟的则成于今年5月。但全书在时间上虽先后跨越了二十个年头，而实际的撰写则集中在50年代之末和70年代之初，中间足足有十年的岁月我几乎没有写中文论著的机会。1973年之秋，我回到香港工作了整整两年，重新结下了文字因缘，因此本集所收的，70%以上是最近两年的作品。

为了照顾到一般读者的兴趣，选在这部集子里面的文字大体上属于通论的性质，凡属专门性、考证性的东西都没有收进去。所以这部选集的对象并不是专治历史与思想的学者，而是关心历史和思想问题的一般知识分子。通论性文字之不易落笔，我是深切了解的。通论是所谓“大题小做”，往往不免要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加以简化，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而且作者的知识 and 主观见解，又处处限制着论点的选择、资料的运用，以至文章的剪裁。因此任何通论性的题旨都达不到最后的定说。照理想来讲，通论必须建立在许多专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说始能稳妥，而事实上，每一范围稍广的通论性的题旨都包含着无数层次的大小问题，如果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写通论，那么通论便永远不能出现了。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哲学上的一个“吊诡”（paradox），即“一个人如不是对一切事物皆有知识，便不能对任何事物有知识”（One does not know anything until one knows everything）。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一题旨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全无所知，也可以动手撰写关于该题旨的通论。清末的朱一新曾说：“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又说：“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朱氏所说的确是深识甘苦的话。本书所收的一些文字，在我已力求其有根据，但限于学识，议论却未必中肯。读者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地看待。

本书所收诸文先后曾刊载于各种期刊上。香港方面是《自由学人》、《人生杂志》、《祖国周刊》、《中华月报》（以上四种均已停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中国学人》、《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和《明报月刊》；台北方面是《幼狮月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和《联合副刊》。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主持以上各种刊物的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文字几乎全部是被主编、朋友们逼出来的，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至于这部文集之终于能和读者见面，则要感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热心，特别是编辑组陈秀芳小姐的说服力，他们使我相信这些散篇文章还有汇集成册的价值。这部文集基本上是从一个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场上写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个专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专门著作，虽则我的专业训练处处影响着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mental technician）。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则只是知识从业员。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

《历史与思想》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精彩短评

- 1、 很多篇之前看過。
- 2、 此书号为《基因和遗传》 谈家桢 科学普及出版社
- 3、 借自校图。很好。
- 4、 非常充實、睿智的一部文集，讀讀停停，竟一個月才閱畢。可惜這些四十年前的通俗普及文章，今天的一般讀者恐怕也很難有興趣了吧。
- 5、 這個排版讀不慣啊看得頭暈好些地方囫圇過去了
- 6、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
- 7、 :无
- 8、 我手里的这本居然是民国65年9月初版的.....会不会很值钱啊.....年太太过久远，书脊最终还是被我弄破了.....
- 9、 余先生文章的价值自不用说。仅从此书的编排，选文来说，亦是极好！极具作成专书发行之价值。
- 10、 本册属通论性质的结集，能读出余先生作为知识人之关怀，又不失学人之守专。其实无论博雅或专家，只是一个学者的主体性，只是一个心。假如学术环境空间有限，博雅离却对家国社会命运的关怀，专家只剩闭门自守的余力，这就是主体性的分裂。这种时代里，坚守住学者的主体性，写出来的文字就是很不一样了。
- 11、 睿智卓识
- 12、 那一个个指南山上下雨的周末的下午

1、英時先生此書是見報文章結集，時間上溯中共建政，下迄文革將盡，內容森羅萬象，足見先生讀書思考之廣。讀書筆記一整理，便是上好的譯介論文。然先生並非替西人背書，他自有其真知灼見，所謂溝通中西文化必得有如是功力。至於什麼「最後一位儒家」之說（此名號坊間冠以數人，不一一），我反正不信——余先生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當世大儒」麼！書中文章繁蕪，難以梳理主線，但大致集中探討了幾個問題。我並不能添易一語，唯有談談自己因之而起的些許思考。無知闕漏之處，還望讀者海涵。一、反智主義與長輩先生談的是反智主義與中國政治傳統，要旨在古代溯源。雖則四九後重傷故國文化，但我們知道，傳統是不死的，不過是變換方式存在于所謂現代之中——譬如反智。所以跟不少長輩們辯論問題時，尤其是現實政治問題，常常不歡而散，放假回家真以為自己是海歸。如何能與他們說清楚？你講歷史，他們說談當下別跟我扯陳年舊事；你講理論，他們說你書呆子不懂實踐；你講現實，這下好了，長輩們起碼比你多活二三十年，社會上見多了去，你辯得贏嗎？即便使其一時語塞，也未必意味著他們想法的改變。可是回想下，現實固然重要，可歷史不重要嗎？理論不重要嗎？培根的名言想必大家都知道，「Histories make men wise」（讀史使人明智）。當然你要讀「史」，而不是打著「史」旗號的「屎」。歷史是鏡鑒，現實無論如何千變萬化，總有其歷史背景、規律在，更甚一步講，沒有歷史的關照，何以看清現實？假如你讀過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我無法想像你對歷史現實沒有一絲轉念。又如賓四先生寫國史，故有其偏頗之處，然在這樣溫情脈脈的文字前，讀者得無對傳統有一新體認乎？理論道理複如是，我不贅言。理論與實踐並不能截然分開，這點留待後文談工業文明再敘。在長輩們的反智「傳統」（如果算的話）背後，隱約可見幾十年來對「智識」的摧殘與扭曲。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人都是臭老九，這種標語正是反智傳統與時代政治運動結合的產物。至於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其內在邏輯仍是將「知識」當作牟取利益之媒介，一如今日之教育，考試並非選拔人才，而是淘汰不合體制者也。知識之增長，有賴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體制要這種人嗎？在如是體制裡浸潤數十年，人們能真的尊重知識嗎？二、內在理路與史學先生好幾篇文章談及史家、史學、史觀。就我之淺薄而言，特別感興趣于先生所謂「內在理路」（inner logic）。歷史之遷變，固有其諸多外在因素，然最重要者乃是其內在蘊育的變因，終至「逼出」（先生好用此語）新的東西來。在談及清代學術時，先生指出宋明理學以降內在理路之發展，認為傳統定義朴學為理學之反動並不妥當。先生研究朱熹與理學是後來的事了，不過看得出他對理學早有深刻思索，《朱熹的歷史世界》正是他自己的內在理路給「逼出」來的~至於談章學誠、柯靈烏，非我專業不敢妄自評論。不過對黑格爾馬克思一路的「歷史哲學」的評判，還是很啟發人心的。那種唯物史觀包裝下的「宿命論」，終究也難逃唯心的影子。三、工業文明與理學先生指斥五四先驅們好將新文化運動比附文藝復興，並不真正懂得工業文明發展之歷程。譬如推行白話文，屢屢徵引歐洲各國土語取代拉丁文的事蹟，不曾注意到這一取代過程長達兩三個世紀，各國方言與拉丁文相互借鑒，最終在各國語言獨立的情況下，依舊保有「全歐性」之意識。以前我從未想過這點，也算是受了五四先驅的誤導，以之反觀中國，草率廢除文言，將兩千年口語書面兩套系統打破，純用白話，卻又不願學習文言的優勢，終於在歐化、共產化夾擊下，現代漢語狼狽不堪。今日之翻譯界，喜好直譯硬譯者最樂道的藉口便是：「五四後還有好的中文嗎？還不如順著原文句法呢！」再譬如所謂「科學」，中文語境下常常用於特指「自然科學」，然先生講，考諸拉丁詞源“scientia”，本義其實是「有組織的知識體系」（organized body of knowledge）。按《說文》「科」為「程」，乃條理法式之意，譯為「科學」實在妥貼。所以國人拿「科學」當「正確」用並不很準確，蓋「有組織」不代表有邏輯、無缺陷。話題扯遠了。先生主要是以介紹Nef教授的著作為線索，梳理工業文明發展之進程，駁斥馬克思以來學派過分重視經濟之作用而無視文化本身，同時指出理學在工業時代之新用。我的轉述很拙劣，但我很佩服先生，因為新儒學的東西多少瞭解一點，但總覺得懸空而談無法信服；真正能說服我，使我真正確信傳統學說在現代文明能煥發新生的，舍先生為誰？順便回應一下開頭的伏筆，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工業革命固然催生近代文明，但近代文明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並不依賴工業革命始能完成；換言之，文明本身亦推進科技之發展，二者並非單純的決定關係。所謂「需求推動革命」，大而化之常常漏掉很多關鍵細節，可不慎哉？四、兩個世界與紅學「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相信紅迷朋友不會陌生。這其實還是可以回到先生思想的「內在理路」，但他主要談的是孔恩（Kuhn, 大陸譯為「庫恩」）的「典範」（paradigm）理論（參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基於此，他認為胡適所開創之新紅學，固然有許多訛誤闕漏，但這是開創新典範所共有之特徵，不足深責；反言之，正是要感謝

這些開創者，為後世研究者指出一條新路，激勵學術之發展。（其實這點用於魯迅與胡適的比較公案也不無啟發，魯迅往往是繼承者的形象，而胡適卻是創新風的干將。）先生繼續順著「內在理路」分析，紅學中考據派與索隱派之爭辯，天長日久便「逼出」新的思索，特別提到的是俞平伯後來關於紅樓夢的隨筆。先生以為俞平伯的思考已經隱約暗涵新的典範，可惜共產批判運動很快將其打倒，使他不得不追隨大流改變自己的觀點。先生寓居海外，奮起為之，提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身處四十年後，不知當年可曾引起紅學界之震盪？倒是先生有句話深有意義：「在大陸上，誰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寫『前言』或『代序』，誰就是紅學研究方面的『當權派』。」從革命紅學到紅學革命，回歸文本是必然趨勢。但若沒有新的典範確立，紅學的路怕是很難走下去了。五、所南心史與曲學以前看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深為折服（兼指二人）。難以想像四十年前讓人「驚透骨」的廣州，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如何始終恪守自己的原則，如何曲盡詩文以俟後人。一九六四年陳先生《贈蔣秉南序》有言：「默念平生，固未嘗悔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南周有篇評論，呼籲大學教育不要「曲學阿世」，底下的回復都是在罵作者simple、naive，這世道變得，骨氣都成了笑話。先生于「曲學阿世」最為痛恨，想必沒有異議。《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引用先生答覆科學院的信：「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八十年代學術復興，但重新評價陳寅恪的學生者，依舊是稱先生已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色彩，欲以此為其正名，我恐怕陳寅恪先生寧可承受「資產階級史學」的指責。先生致劉銘恕的信中分明說自己的研究並非「太史公、沖虛道人之新說」（按：此乃避開審查之隱語，太史公即司「馬」遷，沖虛道人即「列」禦寇，合為「馬列新說」），本來話說至此已足夠；但深論之，先生秉承乾嘉學派與德國蘭克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本非同道。再看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開首便說老師已經「從資產階級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轉變」，為替老師正名而硬是比附馬列，這正是老師所痛恨的「曲學阿世」啊！先生泉下有知，怕是唯有心酸而已矣！昨夜睡前再讀英時先生的《陳寅恪 論再生緣 書後》（此書最後一篇），興起上網搜尋相關史料，不意得知「馮衣北」身份名氏均已昭示天下。感慨系之，一時無言，就此擱筆吧。英時先生嘗引朱熹詩句為釋證一書作序，謹借用以示銘感。

2、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思想。没有老子，就没有道家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思想是文学最高境界。

章节试读

1、《历史与思想》的笔记-第476页

余英时先生在本书前三分之一着眼于中国治史思想，印象最深者，当为他将柯林伍德与章学诚相比，并提出在清代考证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有的科学史观的主张。强调了兰克史学的几个弊端，认为历史不应全被为自然科学一类，历史学家须有其自主性，并对能够贯通古今的“史才”大加褒奖，对写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瑞士历史学家Jacob Burckhardt尤其不吝赞词。接下来的三分之一里，他畅谈西方人文思想，介绍它在古典主义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承。这几篇对我而言很是新鲜。他先讲由苏格拉底至柏拉图再至亚里士多德这一脉，从肯定人的理性、强调人的尊贵起，至柏拉图时将形式与物质截然分离，再至亚里士多德用较世俗的观念将二者合二为一。又兼及古典主义尾声时的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时，人们重视灵远胜于欲，因此谈不上什么人文思想。此种情况至文艺复兴时期又有所转变，这时期启蒙者先是从讲究修辞和文法的角度出发，大量钻研和借鉴古典文献，并在这一热潮中渐渐受到古希腊思想的熏陶。此处讲到，辟柯（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对人的灵魂之自由的介绍尤为有趣。在他之下庞朋纳粹（Pietro Pomponazzi）等人就渐渐生发出人对上帝的敬意要在俗世之中达成这种近乎新教伦理的思想了。在这一部分之末尾，他又述及工业文明的精神源头，称十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重视数量的精确的文化现象，此时英国、荷兰等地的工业继承了意大利城邦中追求美和艺术的风气，注重工艺品的生产，而英国和北部一些国家的工业则以大量生产廉价商品为特征。最后三分之一，余英时先生颇花了一些工夫介绍红学，除了“两个世界”一篇，其他于文牍之中搜求佐证的文字真是闷死了，我只扫了几眼。全书最末一篇讲《论再生缘》一书所体现的陈寅恪先生的心事。我于此时才知陈寅恪与陈师曾的关系，才知陈寅恪个性之孤高不群，才知他后半生的遭际凄凉。最有所触动者，在于陈寅恪自称盼借一己之力使“再生缘”再生。众所周知，自五四以来，中国即有不少人认为若要接受西方文明以自强，非打破固有的传统而不能成立。（当时，传统的力量在中国自然影响广泛、不易撼动。）而中共建政以来，打破传统建一新中国成为人人传诵的口号。陈寅恪先生尚独立、自由，在当时的环境下，不知是何等心境？想到余英时先生在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设计时讲，建筑中新建的部分总是小小翼翼地避免遮住老建筑的美。两相对照，同样不知该作何感想。。。。。

2、《历史与思想》的笔记-第157页

在这一篇里，余先生提出了把清儒对道问学的追求，即考证一脉的发展，视为儒学历史上的新的进步。儒学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映衬下，就树立纯知识体系而言，在表现上大显逊色。余先生由此提出一个设想，能否把清儒的道问学视为儒学向纯知识体系靠拢的一个开端，并加以扶持，冀望中国儒学可以由此而抗衡西方科学。这真是有大格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